

阎纯德 著

二十世纪 中国女作家 研究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I206.7
55

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

阎纯德 著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阎纯德著.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ISBN 7-5619-0535-1

I. 二…

II. 阎…

III. ①女作家—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②女作家—作品简介—中国—现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7481 号

责任印制:乔学军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 刷: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7.375

字 数:4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书 号:ISBN 7-5619-0535-1/G·9104

定 价:26.50 元

自序

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是幸福的。因为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是我认识人生、了解社会的历史书。在我半生教书过程中，先后接触过数百位作家，有的我写成了文章，有的还没有完全写好，《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就是我这个方面所写文章的一个部分。在编好这本书之后，关于女性文学研究，觉得还有许多话想说。可是，篇幅有限，我只能少说了。

女作家是幸福的，因为她们能以独特的思想和艺术视角体悟社会、透视人生，于是她们的作品，便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格特点。

中国女性文学建设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跟随着新文学的步伐，也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经过“五四”时期第一代女作家的艰苦开垦，中国女性文学的体系和基础已经基本形成；再经过以后几十年的曲折拓展，尤其经过20世纪末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繁荣，中国女性文学的总体审美架构，已经比较坚固合理，其题材体裁、艺术形式、风格特点等等，都呈现出多元层面的丰富性，这便是一种趋向成熟的表现。

虽然强烈的政治品格一直主宰着中国文学，但在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史里，政治色彩却在时多时少、时浓时淡地发生着变化。中国的女性文学同中国新文学一样，一开始就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庐隐、苏雪林、冰心，还是丁玲、萧红、张爱玲，更不要说以后的杨沫、茹志鹃、刘真、宗璞、张洁、谌容、张抗抗，或是更年轻一些的王安忆、铁凝、残雪，等等，尽管她们都是大手笔，拥有不同的作品不同的风格，但她们的成长都同时代有关，她们的文学足迹，都无一例外地有意无意地踏在政治铺设的道路上。文学虽然具有感染读者、影响社会的力量，但它毕竟不能主宰社会，有时甚至很“无力”；但是相反，文学的前行，又相当地依附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在特殊的景况下，还往往被政治主宰着。当然，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虽有自己运行的规

律,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大小人文背景,都会对它的话语方向和秩序构建产生影响。女性文学虽有自己的特性和发展规律,但它的生存也不可能超越内在的不可视的无形绳规约束。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中的中国女性文学,无论是伤痕、反思、寻根,或是新写实等等,这些女作家的文学书写,多属于政治模式下的书写;而到了90年代,虽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倾向越来越明显,但是政治依然是作家不能离开的精神主宰,因为“使命感”,在多数作家的灵魂中,还是时远时近的灯塔。

文学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是有共性的,而作用于这共性的“东西”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国女性文学在最初求生之解放斗争中,没想到几十年后又会走进商业社会的网。据说这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在这个网里,人都变成了“鱼”。表面上“鱼”是自由的,而实际上自由是有限的,因为这网,既有它美丽的一面,也有它丑陋的一面。

中国女性文学从一元走向多元,是文学的一种发展。女性写作越来越多的“私人化”书写,使女性文学越来越偏离自己的康庄大道。那些“私小说”,作为文学的一元,固然也不是坏事,“女同性恋”、“恋父”、“自恋”、“自慰”、“隔代异性恋”等等,虽然可以写,但这毕竟不是文学效法的样板;关于“私小说”,当时的作家对批评家们说三道四的不同批评可以不管,但是女性文学绝不能只有“个人书写”才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不能只是“私人化”作品,女性文学不能以“性”的解放为标准,文学不应该放逐自己,不能只顾自己,不管读者,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的人,其作用是不同的。有的作品对人是教育,有的是娱乐,有的是鸦片。当然,“私小说”有的是娱乐,有的兼有认识意义,但是再往前一步可能就会变成鸦片。文学在人类社会中作为一种可以触摸的文化,它更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命运,作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因而,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是不应该“玩”文学的。

一个作家,其创作风格和追求是与他的生活分不开的。这种生

活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即包括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和历史阅历，等等，这些决定着作家的感情方式与思维模式，决定着作家创作时的构思和对题材的选择，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和观察的视角。

现在，年轻的女作家，其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放的环境，使她们的思想、意识、观念与道德，都会自然而然地与前辈相异不少。但是，她们缺乏历史和生活的视野，因此在描写生活和刻画人物方面，往往流露出一种浅薄和无奈。作家们趋之若鹜的市场消费文化的“文学”时尚，使革命家和女性主义者所为之奋斗的“男女平权”和摆脱男权文化压迫的理想与努力受到嘲笑。因为，一些女作家，正在有意无意或不知不觉地以自己的行动，主动从“主流”走向“边缘”，实践着葬送女性“自我”的工作，使她们在精神上成为“新时代”的受害者。于是，无数女性梦寐以求的自由，在“新时代”反而失掉了许多光辉。

我们有传统，传统在变；我们有时尚，时尚也在变。人类文化将在时空不停的旋转中走向进步，有的传统和时尚被遴选，有的被淘汰。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审美趋向和公共心态，是会不同的。女性文学同所有的文学一样，它也面对无法抗拒的遴选淘汰法则。时至今日，中国文学还没有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圣坛。这个奖，毕竟是世界公认的最高文学奖，至今还没有哪一项文学奖能与它具有相同的信誉力量。女作家应该有这样的抱负，在追求艺术创新的同时，写出国家的命运和精神、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写出人性的光辉和道德，写出无愧于中国，也无愧于人类的伟大作品。

在人类跋涉到 21 世纪的时候，科学、技术、信息的迅速发展，显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以科学、技术和信息为标志的“新时代”，直接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的观念越来越大。理论界和实际中出现了有个所谓“全球化”，“全球化”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以及相异文化之间接触、撞击、融合之后的“和平对话”。“全球化”首先从“经济”和“网络”进入我们的生活，然后再以不同方式走进我们的思想和意识，深深地浸染我们的文化，揉搓我

们的灵魂。从“理论”和“逻辑”上讲,在国家和民族似乎“失去”围墙的情况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到伦理、道德,人们似乎不得不在喧嚣或沉默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受这个“新时代”的“洗礼”。这是一个挑战。

经济“全球化”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全球化”的覆盖下,一般说,文化与文学必然会出现一些始料不及的“新生点”和新趋势。但是“全球化”不是世界大同,人类文化不会大一统,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不会泯灭,这是一个问题的另一面。美国口口声声维护的是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中国也一样,我们也不会让“全球化”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前途。作为文学,在21世纪,尽管消费文化和“消费文学”残酷挤压传统的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学,但是传统文化和严肃文学,其传统精神和保守主义,也会通过自己的发展变化,在不断的自我保护中更加完善。

在大的人文背景下,作为文学族群里的中国女性文学,21世纪如何发展?以何种美学理想为它化妆?这是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

历史像一条河,来龙去脉,——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人们可以从记忆和现实中找到它的发展趋势。现在天气很晴朗,站在世纪的瞭望台上,我们可以一览无余地回望20世纪的成功与失败;然后,转过身,向着新的太阳,以那些经验和教训为镜鉴,并以清醒的头脑,就可以比较清晰地眺望未来。

1999年春天,美丽的“全球化”被“导弹”摧残得遍体鳞伤,它的青春突然显得如此苍老。我觉得“全球化”的大趋势很脆弱。但是“全球化”好像还在行进中。如果“全球化”不是多元化,世界将变得十分危险。为了这种担心,于是我从梦里回到现实,因此想到我们的文学,想到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否应该少一些“私人”话语,多一些人文关怀和“中国”情结、“人类”情结。作为一个读者和研究者,我从来都以宽容之心对待作家的创作,但是只是希望多一些创新的富有个性的作品。同样,作品千人一面式的“标签”或“口号”,也是文学艺术的耻辱。不管“全球化”将是如何“化”法,政治、经济、文

化的独立不会消失,未来世纪不会变成一元。这种人文背景,便多了有利于作家创造富有个性化作品的可能。女作家们需要摆脱平庸,战胜自己,追求成熟,创造性地思考和工作,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写出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文学精品。

我借“自序”,又说了一些关于女性文学的想法。最后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不是我的最后成果,我期盼着不久能出版“续编”和《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等书稿。

现在是出书难的季节。商潮把文化浸泡得几乎失去了尊严。然而,文化毕竟有尊严,这一点历史将会慢慢地做出科学的论证。

谢谢出版社领导、编辑、校对和为录入排版、制作封面的诸位朋友!这部书无疑是大家精诚合作的成果。

阎 纯 德

1999年9月19日于北京西三旗九龙窝

目 录

自 序	Ⅲ
简论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	1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	9
陈衡哲:《小雨点》及其他	24
苏雪林:从《棘心》到屈赋研究	40
庐 隐:“五四”的产儿	73
凌叔华:高门巨族的精魂	99
冰 心:爱,永恒的圣火	111
杨 刚:生命的自由式	144
谢冰莹:永远的“女兵”	166
沉 樱:文坛的蒲公英	195
罗 洪:真正的小说家	213
白 朗:英雄人物的画师	230
曾 克:走出宗教寓言之后	244
黄庆云:南方的云	257
李 纳:一泓明净的水	273
杲向真:“上帝的孩子”	290
菡 子:追求诗的战士	305
张爱玲:苍凉人生	335
柳 溪:从历史大河里游来的作家	358
聂华苓:文学理想的建筑师	396

黄宗英:精神世界的绿荫	419
邢院生:女性三部曲	432
贺抒玉:三秦大地的生命之歌	443
柯 岩:美的追求者	460
葛翠琳:童话王国的“皇后”	484
赵淑侠:流浪人生的东方情结	497
梁凤仪:“勤+缘”的文学之光	526
后记	544

简论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

中国女性文学，在 20 世纪，以解放了的“自由女神”的姿态，走过了 80 年的历史，扮演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代替的重要角色。她艰难过，潇洒过，困惑过，辉煌过，她表现出来的种种文化现象，作为世界女性文化一支无垠的山脉，其景观是美丽迷人的，但仍然需要不畏艰苦的人们深入其中，去探险，去追踪，去开发，研究其重大课题。

女性文学是一种社会存在。它与人类文化同源，而发展并不同步。当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世界便成为男性话语的中心，于是地球便有了性别歧视，女人便失去了语言和经济地位，成为被榨取者、人类社会二分之一的缺席者，她们只是男人室内的一朵花，一只笼中的鸟。这个由男人控制的舞台上，不停地演出着女人的悲剧故事。然而更为悲剧的是，一切压迫、奴役和蹂躏，女人不仅不认识，却还视此为“命”，为“天经地义”。

中国有一个漫长的黑夜，男尊女卑的“传统”远比长城古老，中国妇女的苦难远比大海还深。她们身上的镣铐，灵魂上的枷锁，“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儒家教条，整整奴役了她们几千年。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一句名言：“在每一个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总的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女性文学的生存状态和发展，与妇女觉醒、解放、教育的程度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其中妇女的解放，则是最重要的因素和条件。在人类历史上，西方妇女觉醒意识萌发得比东方早。西方妇女思想解放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在中国，20 世纪 50 年代还有妇女不肯放弃“三寸金莲”。中国人头上有一座封建主义的大山，中国妇女头上，在这大山之上还有一座无法推倒的“雷峰塔”。东方文明被旧礼教禁锢成一个“没有女人”的黑暗、落后、保守的强大帝国，这畸形的怪物，却被称为中国“文

明”，一朝朝一代代地深其根固其蒂，成为一座镇压东方地平线的大山，死死死地遮住那轮太阳，从远古一直到20世纪。

在西方，女性文学是与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批评、妇女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事实上，女性文学又绝不是这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概念。在稍近的人类历史上，英国出现过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简·奥斯丁、巴勒特·白朗宁、弗吉尼亚·伍尔夫，法国有乔治·桑、高莱特、朱丽娅·克里斯多娃、艾莱娜·西芬、玛格丽特·尤瑟纳，美国有琼·里斯本、贝蒂·麦克唐纳、玛格丽特·米切尔、玛丽·比尔德、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艾丽斯·沃克、玛丽安娜·摩尔，等等，这些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女作家。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以来，就有瑞典的西尔玛·奥蒂莉娜·洛维萨·格拉洛夫（1909年）和奈莉·莱奥尼·萨克斯（1966年）、意大利的格拉齐亚·黛莱达（1926年）、挪威的西格里德·温塞特（1928年）、美国的赛珍珠（1938年）、智利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1945年）、南非的纳丁·格迪默（1991年）、美国的托尼·莫里森（1993年）等八位女作家均因在创作上再现了伟大的人性、生命的意义、人类的理想及伟大创造而获殊荣。

文学是人学，是社会之学，只有有了人的解放，灵魂的自我主宰，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汪洋大海里，女性文学不啻是被巨浪袭击的小岛，抑或巨石下的小草，难得见到天日，得到发展。当女人挣脱天、地、神和宗法的桎梏后，或朦胧，或清晰地有了自觉和自我意识时，女性文学才开始枝繁叶茂。

中国古代《诗经》里的情歌，是中国女子最早的歌唱。春秋时代的涂山氏和许穆夫人也许就算中国最早的“女作家”。许穆夫人的愤懑、爱国之作《载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诗经》），即是最早的抒情诗。日后的儒教文化，三从四德，温柔敦厚的诗教，窒息了无数女子的天赋才华；但在中国文学史里，毕竟还能找到西汉的唐山夫人、卓文君、王嫱、班婕妤、徐淑，东汉的班昭、蔡琰、曹大家，魏晋的左芬、苏蕙、刘令嫻、谢道韞、苏小小、鲍令暉、刘令嫻，唐朝的徐惠、上官婉儿、李冶、薛涛、元淳、薛媛、张文姬、鱼玄机、

刘媛,宋朝的魏夫人、李清照、孙道绚、朱淑真、唐婉,元朝的管道升、郑允端,明朝的朱仲娴、端淑卿、徐媛、王微、沈宜修、方维仪、商景兰及清朝的徐灿、倪端璇、陈端生、邱心如、贺双卿、沈善宝,等等,仅就能查到资料,有作品传世的,不下数百人之众。这些多为帝王后妃、宫娥、闺秀、歌妓、尼姑组成的“女作家”,能像蔡琰、李清照那样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者,实属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虽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李清照《乌江》)“滚滚银涛,写不尽心头热血。问当年,金山战鼓,红颜勋业……”(清·沈善宝《满江红·渡扬子江》)这样气势磅礴的悲壮作品并不多,然而,她们无限的哀怨,声泪俱下的倾诉,却是对世事、命运微弱的不平之声。

19 世纪末,受到西方文明浸染的中国第一批先驱者,他们最早给中国以启蒙,带来了 20 世纪的信息。秋瑾作为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一位历史人物,为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奠定了精神基础。她的《宝刀歌》以恢宏的英雄气概,一扫旧文学中女性那种悲悲凄凄之音。虽然她在 20 世纪只生活了七年多,虽然这位“鉴湖女侠”的诗文基本属于旧体,然而她创办《白话报》、《中国女报》,提倡男女平权,她的思想在当时属于中国整个思想界的前卫,属于 20 世纪,她的文学创作及活动属于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中女性文学的先导。她诗文中的爱国意识、反叛意识、批判意识、新的女性意识,直接影响过许多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女性,尤其对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批女作家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秋瑾是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女性文学与新文学史上女性文学的一道分水岭,是后者的一個精神源泉。

辛亥革命后,尤其“五四”运动那场伟大的文化运动风暴,以摧枯拉朽之势洗刷了中国古老山河的面貌,封建的黑暗闸门被新世纪的惊雷轰毁,中国妇女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空气,一扇天窗使得渴盼春天的妇女看到了世界的风景。妇女运动,作为 20 世纪中国革命潮流里的一排巨浪,也不停息地向前奔腾,但女作家的成长还是极为艰难,社会上许多恶劣的因素(历史的、传统的、社会的、世俗的、心理的、自

身的种种痼疾)都像磐石一样,压在渴望自由生长的小草身上,她们往往被迫辍笔,半途而废。但新时代的大门毕竟已经打开,人们看到的毕竟是“长城内外”的立体世界,听到的声音毕竟汇合了世界的回声;于是陈衡哲、谢冰心、庐隐、冯沅君、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丁玲、石评梅、陆晶清、许广平、林徽因、白薇、陈学昭、谢冰莹、沉樱、赵清阁、萧红、草明、李伯钊、罗洪、罗淑、葛琴、白朗等二三十年代先后成名、成就卓著的女作家,尽管她们所走的人生道路不同,但都是从封建的图囿中冲杀出来的,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伴随新文学的诞生而出现的第一次繁荣。但这种兴旺景象并不长久,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致使不少女作家在文坛上只是昙花一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长出来一批女作家,张爱玲、关露、梅娘、苏青、潘柳黛是上海“孤岛时期”和北方沦陷时期文坛上的佼佼者,杨沫、菡子、袁静、曾克、逯斐等人则是另一种生活和道路铸造的文坛之花。当共和国的太阳升起之后,杨沫、菡子、茹志鹃、刘真等人,好像才真正踏进了火红的青春。在新中国现实主义一元化的形式下,《青春之歌》、《妈妈的故事》、《百合花》和《静静的产院》、《长长的流水》和《英雄的乐章》及宗璞的《红豆》等文学名篇,皆以文学本身的意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闪光。

中国人过分的聪明才智,弄出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自焚式的“文革”之火,使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文化、道德遍体鳞伤,元气大减。但我们这个“地大物博”、“问题众多”的国家,毕竟文化凝聚力强,因此大地春回之后,作为社会生活领域“晴雨表”的文学,最早焕发了青春。一个拥有各种年龄层次、几代女作家汇集的“娘子军”,形成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壮观的文学景象。

生活证实了物极必反的道理,文化大革命播种了灾难,酿制出一个个悲剧,但绝望中也有新生的太阳。社会内在的哲学逻辑,将人文精神在动乱之后作为一种特殊形式转化出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从盲目走向自觉,简言之——这便是人的解放。新时期文学是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观,而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则是奇观中的奇观。以丁玲、冰心为首的老一辈作家返老还童,激情勃发,成绩斐然;另一些资深作家,如韦君宜、李纳、黄庆云、李建彤、崔璇、杲向真、葛翠琳、丁宁、贺抒玉等,都将多年积累的思索与激情迸发出来,写出影响广泛的短篇或长篇小说。50年代和60年代初,像茹志鹃、刘真、宗璞那样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为数不多,创作景况颇不景气,女作家还布不成阵。1977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变,一些女作家经过十年的沉默和思考,似乎突然成熟起来,出现了创作高峰期,佳作纷呈,奠定了她们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茹志鹃以《剪辑错了的故事》和《草原上的小路》、刘真以《黑旗》、宗璞以《弦上的梦》等作品突破和超越自我;柯岩、柳溪、黄宗英则跃居女作家浩浩荡荡的“马拉松”第一方阵之中。“老同志”新作家——珠珊、德兰、邢院生等人,其长篇小说创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是“新时期”的“新事物”。而更为奇迹的是年轻、聪明、富有才华的女作家群的崛起,她们带着从未有过的朝气和时代色彩凌厉地跻身文坛。这些作家有谌容、张洁、张抗抗、王安忆、叶文玲、舒婷、戴厚英、铁凝、温小钰、陈祖芬、航鹰、程乃珊、李玲修、竹林、张辛欣、戴晴、陈慧瑛、王英琦、黄蓓佳、陈愉庆(达理之一)、王小鹰、霍达、范小青、傅天琳、李天芳、陆星儿、马瑞芳、张曼菱、凌力、严亭亭、严歌苓、乔雪竹、刘索拉、残雪、方方、池莉、蒋子丹、林子、王小妮、梅绍静、李小雨、伊蕾,以及后来的赵玫、迟子建、陈染、徐小斌、毕淑敏、林白、徐坤、斯妤、张欣、韩小蕙、唐敏、周佩红、海男、林珂、翟永明、陆新瑾、曾明了、裘山山、须兰等百余人,形成一个光芒四射的珍珠串,一道永不消失的东方彩虹。在百花齐放的时代,她们或现实主义地描写“伤痕”和“反思”,或在文化里“寻根”,希望找回原本属于中国的人文精神;或以“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艺术手法,沿着“现代派”的河岸,寻觅艺术的大海;或以“写实”、“新写实”作为文学操作之魔杖,在现代社会里探索生活的原生态和人性。这些女作家,犹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她们之中,有的早已名满文坛,驰誉海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66193

文学现象是复杂的。但女作家的涌现,与新时期文学繁荣有着基本一致的原因。在人类历史上,乱世、暴政之后,清明的政治,发展的经济,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活,加之痛苦经过咀嚼,教训得到总结,历史得到再认识,这些都是文学繁荣的前导。而女性文学的发展,则更是社会解放与进步的象征。

一水相隔的台湾和海外,那里有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女作家群体,其中多数都为大陆读者和文坛同仁所熟悉。虽然她们分别生活在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但她们的文化之根、创作母体,都深植于长江、黄河浇铸而成的摇篮之中,她们都是这块黄土地上开出的花朵,或是由这块土地飘撒出去的种子而结出的文学果实。台湾的女性文学,以苏雪林、谢冰莹、林海音、张秀亚等作家作为“五四”新文学精神的传薪者,一批又一批女作家的创作都没有离开中国文学传统精神的浸润。就是那些远居异国,时刻为西方文化包围的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赵淑侠、戴小华、尤今等人,其作品也仍然不失“中国的”本色。话再说回来,无论是台湾的,或是海外的,她们毕竟较早而更多地接触了西方的文学、艺术、哲学和先锋文化思潮,所以在她们(尤其是年轻的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中,除了较多地以女性人生经验再现爱情、婚姻、家庭及悲欢离合、流浪感、失落感、孤独感、思乡、思归、对故土的思念和依恋之外,也以现代意识和新的表现形式,再现现代商业社会种种碰撞和矛盾,写年轻人的梦幻、情爱、心态、喧哗与骚动。

香港作为世界商贸重镇,历来被人称为“文化沙漠”。而事实是,从30年代起,茅盾、郁达夫、许地山、郭沫若、萧红、端木蕻良、杨刚、萧乾等及长居那里的李辉英、徐汙、刘以鬯、严庆澍、金庸、梁羽生等许多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在香岛都有认真的播种,因此“五四”文学传统的香火一直不断,并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已使香港逐渐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个中心。香港女性文学的“本土”色彩不浓,因为她们之中来自大陆和台湾的较多;迫于生活节奏的驱使,香港女作家笔下有一种“匆忙感”,但也强烈地透出属于世界潮流的东方精魂。

20 世纪中国女作家的各类作品,以其丰厚的内容反映了从辛亥革命迄于当今的一个十分广阔的社会画面。她们的笔写出了劳动人民,尤其是中国妇女、儿童和知识分子的遭遇、痛苦、不幸、叹息、彷徨、呐喊、抗争、理想和希冀,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艺术形象。她们崇高的感情和情操,对黑暗的憎恶,对压迫的不平,对自由、光明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她们各自独具的艺术个性,在中国文学史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些作家,年龄、性格、经历各不相同,但她们的作品都是心血和爱憎铸炼的结晶,是命运的深刻揭示。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不少女作家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准确、真实地反映时代、现实及其新的精神生活,其中不乏震撼人心的重大题材,可以作为高昂的社会交响乐,长久地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演奏,让人们从中汲取教训和力量,看到真善美和光明。这是她们创造的社会价值和认识价值。

女作家由于心理素质、生活视野、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免不了要以女性独具的艺术气质和方法感受生活、分析人物、观察世界,于是便有了独树一帜的温情委婉、细腻秀丽的艺术风格。她们的作品既有艺术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我”性展示、人物刻画、心理描写、语言运用方面的艺术功力和匠心。与 30 年代女作家作品的思想和风格、类型颇有不同,冰心和苏雪林被认为是闺秀派,丁玲和冯沅君被认为是新女性派,而凌叔华则被认为是新闺秀派。而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思想和艺术风格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和超越,大胆、泼辣,充满了反传统的文化意识,甚至表现出某种女权主义的倾向。

女性文学是中国文化工程的重要部分,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翼。研究女作家的成长历程及其现状、成就和创作趋势,有助于中国文学的总结和发展。早在 30 年代,这一研究曾经受到重视,出版过阿英的《现代中国女作家》(署名黄英)、贺玉波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张若谷的《中国现代的女作家》,以及草野的研究著作和《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女作家自传选集》等一类论述女作家创作或生活的书籍。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一研究相当冷落。中国社会生活的转机,